

研究将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目的性价值判断，也就不可能充分自觉认识到自己的责任。这样的研究者结果甚至也就不知道该对什么样的研究对象采用“信息公开”“责任说明”“对话”等“验证程序”。

[IV]

结语

在现代中国研究领域，一种相互联动的“共同主观性”在中日两国之间施加着影响。在这种“共同主观性”中，存在着以“东方主义”为代表的认识偏见，也即将欧美世界放在“主体”位置，而将亚洲世界（包括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视为“客体”，并给予“主体”以优越性。而率先洞察到这一点的就是竹内好。

如同前面提出的沟口雄三对竹内好的批评那样，竹内好将中国视为可以照见日本的“镜子”，或者说在日本这面“镜子”中观察中国，采取了将彼此作为映照对方的“镜子”的方法来观察中日两国。作为认识中日两国间“共同主观性”的偏见并欲加以克服的方法，竹内好将研究的主客体定位在像镜子一样的“等价”关系的确有一定效果。但是仅仅这样，并不可能从根本上颠覆中日两国之间以及亚洲与欧美之间长期存在的“共同主观性”的偏见即“东方主义”。

1989年3月，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

结》⁶¹中明确提出，在冷战后的国际社会，推动了欧美现代化的自由主义将凌驾于其他所有的政治理念之上，自由主义作为黑格尔定义的“绝对精神”已经步入了“自我实现”的最后历史进程，这种认识直到今天仍处于支配地位。福山乐观地推测，这个最后的历史过程将向“成熟的无政府状态”（B·布赞）或者“安定体制”发展。但是1992年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⁶²则悲观地论述了自由主义文明与非自由主义文明之间的冲突，预测世界将可能走向“不成熟的无政府状态”。⁶³

尽管悲观论、乐观论各有不同，但是福山和亨廷顿都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中，作为“欧美现代化”的理念，自由主义已经进入了在全球范围内追求“自我实现和自我扩展”的阶段。这种推断直到今天不能不说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美国布什政权以“自由主义”国家间从未发生过战争为由，明确表示将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自由主义，认为只有自由主义才是美国和世界安全的基础，而在实际行动中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将“东方”和“西方”之间产生的共同主观性偏见称为东方主义并加以批判，是萨依德和科文的重要贡献。尽管如此，今天我们回顾历史，却只能说这种偏见正在扩大。

下一部分将以“竹内好再考”为中心，探讨从何处入手，可以发现在这一点上进行方法论范式的转化。

- 1 毛里和子在其《现代中国政治》（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3年）〈序章〉中开门见山地说：“中国总是出乎观察者的意料”，并就此议论为何会在对现实的认识和对未来的预测上产生谬误。同样，天儿慧在其《中国：变化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也明确提出：“我国的中国研究为什么总是一贯地被当时的中国‘现实’所翻弄呢？”，并以此开始讨论中国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 2 例如船桥洋一的《内部》，朝日新闻出版社。
- 3 丸山真男：《增补版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未来社，1964年。
- 4 吉本隆明对丸山政治学进行批判，认为其只不过是“大众”作为一个虚拟的形象。
- 5 这里引用的“世界观”是指对世界进行认识时，规定此认识的价值判断体系或意识形态体系。
- 6 列维·斯特劳著、室淳介译：《伤感的南回归线》（上、下册），讲谈社，1985年。
- 7 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2nd Enlarged Edition, 1970. 托马斯·度恩著、中山茂译：《科学革命的构造》，美铃书房，1971年。

- 8 渡边正雄也与度恩持相同看法，他举证了从普特莱奥斯的“天动说”到哥白尼的“地动说”的转变，认为“哥白尼提倡的太阳中心学说完全不是因为观测数量的增加或者观测质量的提高”，他引用伯特菲尔德的评论指出：“哥白尼正是因为给以前的相同的观测数据戴上了一顶新思考的帽子（a new thinking cap），并据此进行考察，才得出了与当时截然不同的结论”。H·伯特菲尔德著：《现代科学的诞生》，讲谈社学术文库。
- 9 柏拉图（Platon）：《国家》，岩波文库。柏拉图在关于国家的健全与病态的论述中认为：“（国家的）健康来自于身体的各部分服从于自然的秩序与支配的状态，而病态则产生于事物的存在与自然秩序相背离的状态”。这种国家论明确宣称自己是基于自然中心主义的。
- 10 圣阿古斯特纳斯（Aurelius Augustinus）主张护教论的《神的国度》就是要将天上的乌托邦在地上实现的最早尝试。曼佛得著，月森左知译：《乌托邦思想史考》，新评论，1997年，93-95页。
- 11 战前，高坂正显在其《现代精神史的意义》（同著《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弘文堂教养文库，1939年）中，就在我们后面将提到的超越克服现代论的问题上，尖锐地指出了中世纪欧洲的这种自我矛盾。广松涉：《“近代的超克”论》，讲谈社学术文库，1989年，37-39页。
- 12 下村寅太郎：《近代的超克的方向》，（日本科学史学会编：《日本科学技术史体系6思想》，第一法規出版社，1968年）。此文与前注中提及的高坂的论文一样，也涉及到了战前的近代的超克理论。广松涉前书，42页。
- 13 森永晴彦：《日本人也可以“创造”科学吗？》，（《自然》1976年1月号）。森永对成为现代自然科学学者的条件进行了如下论述：“亲近自然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与成为自然科学家决不可混为一谈……。反过来我倒认为对于自然科学家来说必要的是从外部观察自然的精神，是对知识没有主观热情”。渡边正雄的《作为文化的现代科学》（讲谈社学术文库，2000年）也持有同样观点。
- 14 中冈哲郎：《工场的哲学：组织与人》，平凡社，1971年。
- 15 富永健一：《人类的知识遗产79 现代社会科学家》，讲谈社，1984年，5-14页。
- 16 在这个意义上，本来的“观察学（watching）”并没有被列入试图将对象进行人为重构的现代科学的范畴。
- 17 比如大塚久雄：《社会科学的方法》，岩波新书，1966年；高岛善哉：《社会科学入门》，岩波新书，1954年；德永恂：《社会哲学的复归》，SERIKA 书房，1968年；还有猪口孝：《社会科学入门》，中央公论社，1985年等。
- 18 Max Weber, “Konfuzianismus und Taoismus” in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1 Band, 1920.
在这一点上，韦伯本人并没有认为仅仅因为目的论性价值判断的有无就会损害“价值的中立性”。
- 19 冯友兰认为他在方法论上的创新是对宋明理学的继承与发展，并称之为“新理学”。加加美光行《文化大革命与对传统继承——梁漱溟、冯友兰、李泽厚》（《现代中国的挫折——对文化大革命的省察》，亚洲经济研究所，1985年）。
- 20 爱德华·W·萨依德著，板桓横三、杉田英明监修、今泽纪子译：《东方主义》，平凡社，1986年。
- 21 马克斯·韦伯著，富永、立野共译、折原补译：《关于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的认识的“客观性”》，岩波文库，1998年；安藤英治：《马克斯·韦伯“客观性”之意义》（同著，《马克斯·韦伯研究》，未来社，1964年）以及大山冢久雄：《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岩波新书，1966年。原著 Max Weber,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以下有关韦伯的论述主要依据安藤、大山冢的论著。
- 22 马克思著，恩格斯编、向坂逸郎译：《资本论》（一），岩波文库，1969年，9-11页。
- 23 例如毛里和子、天儿慧等主持的“中国的构造变动，1996-99年度文部省科学研究费辅助基金特定领域研究”中，就积极与中国的决策研究者进行交流，并借此对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各个方面提出了日本研究者自己的选择方案。毛里和子编：《现代中国的构造变动1 大国中国的视点》，东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 24 宫西义雄编：《满铁调查部与尾崎秀实》，亚纪书房，1983年，17页。
- 25 平野的“转变”参见平野著《马城、大井宪太郎传》（1938年）。该书在战后经过大幅修订后得以再版。《大井宪太郎》，吉川弘文馆，1965年。
- 26 吉本隆明：《转向论》，《吉本隆明全著作集13 政治思想评论集》，劲草书房，1969年，9页。
- 27 吉本隆明，前引书，18-22页。
- 28 平野义太郎：《大亚洲主义的历史基础》，河出书房，1945年，11页。
- 29 中西功：《在中国革命的暴风雨中》，青木书店，1974年，216-232页。
- 30 这一小部分例外是指80年代开始大力推进改革开放政策后，小宫隆太郎和宫崎义一等曾经参与日本战后经济改革决策的经济学家，接受来自中国政府的政策咨询，起到了顾问的作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最发挥作用的学者并不是专门从事中国研究的研究者。
- 31 比如国际政治学学者猪口孝、五十岚武士、经济学者田中直毅、渡边利夫等，本来并不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却在

- 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方面拥有很大的影响力。
- 32 沟口雄三批评竹内好的中国论，认为竹内过于强烈地显示出要假借毛泽东的中国来批判日本的“现代化”进程。竹内本人并不能算是中国礼赞派，但是大多数中国礼赞派研究者却与竹内持有同样的态度。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东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
 - 33 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东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3-34页。
 - 34 竹内好：〈作为方法的亚洲〉，（武田清子编：《思想史的对象与方法》，创文社，1961年），其后该文被编入《竹内好评论集第3卷 日本与亚洲》，筑摩书房，1966年；同出版社筑摩学艺文库《日本与亚洲》，1993年。
 - 35 筑摩学艺文库《日本与亚洲》，466页。
 - 36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Georges Borchardt Inc., New York, 1978. (日文版) 坂垣雄三、杉田英明监修、今泽纪子译：《东方主义》，平凡社，1986年。
 - 37 “共同主观”是广松涉受到胡塞尔（Husserl）现象学的启示，在认识论和存在论的议论中首先提出的。但是本文所使用的概念如后所述，还包含广松没有论述的“意志论”的内容。广松涉：《世界的共同主观性的存在构造》，劲草书房，1984年。
 - 38 Beauvoir, S (de) *Le Deuxième sexe*, Paris, Gallimard, 1949. 生岛辽一译：《第二性(-)》，新潮社，1959年；井上孝子、木村信子、中岛公子、加藤康子监译：《第二性（决定版）》（2卷本），新潮社，1997年。
 - 39 I·伊里伊奇著，玉野井芳郎译：《性别：女人与男人的世界》，岩波书店，1984年。进入90年代，对这种“性与性别”概念上的区别，朱迪斯·巴德拉提出了异议。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Routledge New York and London, 1990. 该书第一章 Subjects of Sex/Gender/Desire 的日译文为荻野美穗译《性/性别/欲望的主体》（《性别问题》第一章，《思想》1994年12月号，1995年1月号）。巴德拉认为没有社会和文化意义的中立的“性（sex）”概念是不存在的。
 - 40 吉本隆明的“相对幻想”概念是指男女间作为“相对性”而建立的共同的幻想意识。吉本隆明著，芹泽俊介（访谈者）《相对性幻想：N个性》，春秋社，1985年。当然，正如吉本所言，男女间建立的“相对性幻想”与成为社会性的歧视意识构造的“共同幻想”不同，有自己独特的性质。比如恋爱结婚的男女，他们中有的可能需要以“私奔和自杀”的方式来克服社会性歧视的关系意识、阶级、身份和民族等障碍实现他们的幻想。但是这种男女间的“相对性幻想”可能会克服“性别”差异，却不可能克服社会性歧视的“共同主观性”。
 - 41 井上孝子、木村信子、中岛公子、加藤康子监译：《第二性（决定版）》（2卷本），新潮社，1997年。
 - 42 加加美光行：《作为异说的中国革命》，田畑书店，1995年，请参照第三部〈“反现代”精神的败北〉。
 - 43 详细内容请参见拙文《中国—政治·社会》，亚洲经济研究所，1995年。
 - 44 陈东林等编、加加美光行监修：《中国文化大革命事典》，中国书店，1997年，在前言部分谈及了当时中国政府不允许公开进行文革研究的问题。
 - 45 以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契机，毛泽东时代遭受迫害失去政治地位或被迫害致死的干部被恢复名誉或重新走上政治舞台，文革的真相开始浮出水面。这些都极大改变了日本论坛和学术界的潮流，所有的批判炮火都集中到了亲中国派学者的研究上。充当先锋的有中岛岭雄的〈“毛泽东批判”与日本的知识分子〉（《东京新闻》1978年12月8日）；西义之：〈日本的“四人帮”何去何从〉（《诸君》1981年3、4月号）；迁村明：〈朝日新闻的假面：〈论坛时评〉的偏向与欺瞒（完结篇）〉（《诸君》1982年2月号）等。
 - 46 比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的 Yingyi Qian 教授就是1981年北京清华大学数学系毕业后赴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90年在取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就职于加州大学的。另外北京大学在1985年聘请驰名儒学研究领域的杜维明教授来校为哲学系讲授儒学。
 - 47 比如1989年出国并任职芝加哥大学、科罗拉多大学客座教师的刘再复，其他六四事件后前往美国的知名学者还有陈一咨、严家其等人。
 - 48 国分良成：《日本、美国、中国—合作之前景》，TBS出版，1997年。
 - 49 仅有的例外包括以中日关系为主的研究、中日两国政府或中日友好团体成为研究对象也就是成为信息资料提供者的情况等。
 - 50 日本对医学医疗系统的反省始于1963年的胺胺哌啉酮（Thalidomide 又称反应停，催眠药的一种—译注）诉讼案，1965年后随着医疗事故诉讼的不断增多，经过1968年东京大学医学部要求进行大学改革的学生运动，实习生（interne）制度在当年首先被废止了。但是日本最终积极引入知情—同意制度却是在20多年后的1990年，经日本医师会生命伦理恳谈会的建议后才开始的。呗孝一、宇都木伸、平林胜政编：《医疗事故判例百选》，有斐阁，1989年。

- 51 这里提到的“验证程序”中包括什么内容呢？这一点很重要。研究者被置于研究对象者的“验证程序”之下，决不意味着研究者就要无条件地接收研究对象的批判。这与知情—同意的过程中，医生在征求患者的同意时并不见得对患者言听计从一样。相反要求医生对没有专业医学知识的患者进行详细的信息公开，并以此为前提对患者进行充分易懂、具有说服力的说明。在这个过程中，医生通过与患者不断进行医疗“对话”确定最好的治疗方案。在随后也必须针对随时出现的情况，反复利用这种“验证程序”。临床现场医生的第一手资料无疑就是从患者的身体检查中得到的。就是说不管患者喜欢不喜欢，他们都是医疗信息的原始提供者。同时患者也是可能通过治疗得到利益或损害的直接关系者。这一点就是患者有权根据“信息公开”和“责任说明”等“程序”原则接受医生说明的依据。但是医生对患者原则上既不能完全收回自己的见解，也不能完全强迫患者接受。今天，只有这种“知情—同意”程序的彻底实行才是减少医疗事故、通过临床发展医疗医学的良策已成为共识。不过，今日医疗事故日渐多发可能也意味着经过了30多年，这种“验证程序”正在风化而被人们所淡忘。
- 52 NHK 特别节目：“医疗—信赖能得到恢复吗？② 受到质疑的医生的‘裁量’”。2001年7月7日播出。
- 53 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的地域研究科和亚洲经济研究所的地域研究部就是日本学术界使用这种称呼的代表。
- 54 John King Fairbank,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 Harper & Row, Publishers: New York, 1982.
- 55 截止到1995年5月1日，在日外国留学生总数为53,847人。其中来自亚洲地区的留学生为49,212人，占全体人数的91.5%，其中中国大陆留学生为24,026人，占44.6%；大部分亚洲留学生并不是来学习语言，而是以学术留学为目的的。另一方面，日本人留学海外的人数在1995年度为165,257人，其中最多的是赴美留学，为82,008人，占总数的49.6%，到中国留学的人数为第3位，12,947人，占7.8%。大多数赴美留学的目的是学术留学，而大多数留学中国的留学生则只停留在语言留学的阶段。《我国留学生制度概要—接受及派遣》，文部省学术国际局留学生课，1996年度。
- 56 比如1984年东京大学富永健一教授在天津南开大学举办经济社会学和社会发展论的讲座，其全部内容都是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直接用日语进行的。
- 57 十余年前，日本某地的社会学者访问团到北京师范大学进行学术交流访问，当时在那里留学的笔者的学生作翻译。日本访问团用向门外汉讲授社会学基础知识那样的语气对北师大的社会学研究者“讲课”，招来了一片笑声。按照笔者的学生的介绍，日本学者没有一个人明白这笑声中的意味。
- 58 如上所述，在文革期的中国研究中，有不少认为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比较典型的论述有，山田庆儿：《向未来发问—中国的尝试》，筑摩书房，1968年；同著者：《驶向混沌之海》，筑摩书房，1975年。在中国研究以外的领域，比如研究斯里兰卡的中村尚司：《富饶的亚洲 贫困的日本》，学阳书房。在书中，作者从生态学者的角度论证了日本应该学习亚洲的智慧。
- 59 山内一男：《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研究序说》，法政大学出版社，1971年，请特别参照其中的第五章、第六章和补章。
- 60 当然也可能会有人认为，在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学术界内部具备这种“验证”能力。但是学术界内部的相互“验证”只是停留在学术见解有否创新和贡献等争论上，这与和研究目的与研究成果有社会利害得失的关系者所要求的“验证”并不是一回事。
- 61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16 (Summer 1989).
- 62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3).
- 63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Fear*, 2nd edition,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1, pp. 175–177.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